



首页 | 研究院概况 | 学术委员会 | 旅游人类学研究 | 旅游高峰论坛 | 醉美金钟山 | 学术研究成果

今日关注

- 杨慧, 凌文锋, 段平:...
- 第十二届人类学高级论...
- 郑向春: 《主随客便: ...
- 李春霞: 《好客的东道...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新闻阅读

旅游与人类学: 研究与实践

时间: 2011-2-9 11:06:23 浏览量: 629



桂林金钟山旅游度假区·美景

★[澳] Trevor Sofield, 徐红罡

摘要: 旅游快速发展的50年内, 旅游和人类学学科的关系错综复杂, 它们之间更多的是矛盾而不是和谐共处的关系。人类学的理论体系一直被用来批评旅游以及阐述旅游给当地社会文化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大众旅游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尤其受到指责。但是近年来, 情况有所变化, 人类学的理论开始用于指导旅游的发展、减少旅游对社区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旅游人类学; 应用人类学; 旅游发展; 旅游影响

一、关于应用人类学

美国的著名人类学家Radcliffe Brown在1930年发表的“Anthropology as Public Service and Malinowski's Contribution to It”中最先引入了应用人类学这个概念。[①]虽然应用人类学的定义不断地变化, 但其本质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 解决实际问题, 而不是学术的贡献。自应用人类学产生以来, 人类学的学界就分成了两派, 一是学术导向的, 一是强调为发展服务即应用导向的。1941年, Margaret Mead等人为了抗议应用人类学受到美国人类学会的边缘化待遇, 成立美国应用人类学会, 并出版全球第一本

“应用人类学”杂志，宣称应用人类学者要为他们政策建议的后果负责。[②]1983年成立美国国家人类学实践学会(NAPA)，主要针对在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实践者。[③]1999年和2006年出版两本重要论文集，目的是缩小研究导向和应用导向人类学的差距，加强两者的关联和认同感。[④]2006年论文集反映了应用人类学对全球发展的贡献。[⑤]

二、旅游人类学的四个平台

从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历程也可以看出人类学的学术之争。1973年人类学家Jafar Jafari创办的《旅游研究纪事》就很重视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该刊现在成了世界最有影响的旅游学术期刊。[⑥]1977年Smith编著了影响重大的旅游人类学著作《主体与客体：旅游的人类学》，[⑦]其后Nash在《现代人类学》发表了《旅游：人类学的一个课题》。[⑧]尽管这些研究最初并没有引起人类学界的关注，但是确实推动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随后的30多年内，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已经累积了相当的成果。

但是正如Jafari指出的，人类学家与旅游发展历程不简单。受知识结构的影响，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最初对旅游发展都持不友好的态度，多数对旅游的指责并不是来源于实证，而是基于他们对旅游的理解。只有在最近20~30年，主流人类学才慢慢接受：(1)旅游这一现象值得人类学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2)从学术上说，将人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运用到旅游发展领域是可接受的并且是合乎道德的。但是对许多人而言，应用人类学依然是充满争议的。

Jafari在1990年发表了一篇获得国际认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按主题研究法将人类学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分为四个“平台”，这四个“平台”按时间顺序先后出现，每一个“平台”是对前一“平台”的直接响应，然而今天它们作为四股潮流并存着，而不是相互取缔的关系。这四个平台的动态变化反应了研究导向和应用导向人类学之争。[⑨]

Jafari将第一个平台，“宣传平台”，定位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平台的研究者强调旅游对经济的重要性，尤其对外汇、就业和对分权的贡献。“宣传平台”的作者们不加批判地支持这一行业。过去10年中，“宣传平台”又新添了一类拥护者，即认为旅游有利于环境保护、古老传统复兴、文化事业的发展。一些应用人类学家也成了“宣传平台”拥护者。

第二个平台是“警示平台”。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开始质疑“宣传平台”表达的过度肯定的观点，Jafari称之为“警示平台”。他们专注旅游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对旅游持高度批判的态度。他们为数众多，当中有杰出的人类学家和非政府组织成员。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旅游会消灭/削弱传统；旅游使目的地的居民和文化商品化，他们的舞蹈、歌曲、节日以及宗教庆典都沦为“虚伪的展览品”，从而失去了内在价值和深层含义；“垃圾纪念品”和“机场艺术”取代了艺术和传统技艺；旅游区域的资源被外来(国内外)旅游者掠夺一空；巨大的效益流向开发商和投资者(往往是跨国公司、连锁酒店和国际航空)，而不是当地社区，当地社区被边缘化和疏远；旅游是季节性的等等。“警示平台”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热心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的家园。对于任何主张“宣传平台”宣称旅游利益的人而言，“警示平台”就是其对立面。但是“警示平台”的拥护者往往使用例外的案例来说明他们的观点，因而无法开展与其他研究者富有成效的对话。

第三个平台是协调前两个针锋相对的“调整平台”。持此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可以找到一种能够替代现有旅游模式的新型旅游，从而减轻旅游带来的冲击。生态旅游和社区旅游都是从“调整平台”派生而来。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加强旅游者对旅游地社区的责任感、提高其对环境和文化因素敏感性，可以找到不同于大众化、商业化这种“硬”的旅游模式的替代。

不过，这三个平台都不是根植于实证的研究。现在很多旅游研究人员都意识到，只有把旅游当作一个整体去研究，理解它的基本功能和结构，才能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其理论体系。因而，当相关的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量后，就出现了第四个“知识平台”。归属这个平台的学者，宣称这个平台有别于其他的是：坚持用科学的态度研究和理解旅游，提倡旅游或相关方面的研究和论断应基于调查研究而非主观看法和个人情感，呼吁旅游院校的旅游课程应该以“知识平台”为基础，而不是别的。总体来看，跨学科的“知识库平台”以客观分析为目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着重对旅游的整体把握。正是这一平台的出现，促使许多人类学家开始涉足于旅游领域的研究，这也意味着纯研究人类学和运用人类学之间矛盾的渐渐消解。

Jafari基于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出四个平台，中国人类学研究与旅游的关系也出现了相同规律，例如，前三个平台共存，许多观点并没有科学基础，主观推论多于实证研究，运用第四个上“知识平台”的研究者较少，但是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也有自己的特点。

人类学家对旅游的研究，还处在一个起步和摸索阶段。第一篇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影响是1992年刘振礼以野三坡的研究。到目前为止，研究文献的数量非常有限，主要以学术论文为主，没有系统的专门性学术论著。[⑩]

前三个平台出现的时间相继不远，当国内研究者还在宣传旅游的好处时，国外旅游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通过研究的综述、论文或专著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学术界，他们的主要观点、学术派别及其思想，影响了国内学者的观点和对问题的选择。

中国学术界对属于“调整平台”的生态旅游和社区旅游关注度远远高于西方学者。[11]生态旅游在1987年第一次在《地理学报》引入以来，一直都是热门研究领域，而社区旅游在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后也迅速成为新热点。[12]

值得一提的是，近20年来，在民族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旅游对民族文化也引起了国内学者极大

的关注。国内目前许多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对象都是少数民族旅游目的地，而对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社会文化影响持负面观点的多。[13]

三、社区和旅游的多维状态

旅游人类学要科学地理解和分析旅游在发展中的作用，就必须放弃传统的一些思维定式，而代之以系统和动态的分析方法。传统的现代化和文化适应理论认为，当传统社会与技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相遇时，传统社会必然受害。在旅游领域，这种情况被定义为“台球冲撞模型”，即当一个社区或者一种文化(静止的红球)被外力推动的白球(旅游发展)撞击后，社区(红球)只能朝着各种旅游利益集团的合力方向滚动。Wood认为太多研究者按照“台球模型”思路来理解旅游了，[14]事实上不同社区和文化并不是被动的，它们通常会作出积极回应，而不是被动地被外力所主宰。[15]

Pi-Sunyer曾经指出“旅游并不一定导致外部经济力量的控制、当地机构的衰退或对外来者的消极态度。一些社区似乎是在旅游者的带动下繁荣起来”。[16]他把奥地利和瑞士纳入这些地区之列。在他看来，大多数的瑞士人和奥地利人都适应了旅游，他们既可获得经济利益，又不使社会失控。Picard对巴厘岛的案例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17]30多年前他发表的研究成果研究，对该岛的旅游规划产生极大的影响。他详尽地描述了巴厘岛人如何成功应对并适应了旅游对他们的传统文化(艺术、舞蹈、音乐)造成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有机地将现代与传统联系起来。他认为与其说巴厘人在为旅游服务，还不如说他们使得旅游为他们服务。

在新涌现的现代化理论中缺乏对文化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18]虽然把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出发点，可以重新理解旅游发展对文化的影响，[19]但遗憾的是许多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旅游的调查和辩论都“聚焦于旅游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利于发展的还是不利发展的”。中国本土的旅行社会影响研究也大部分在争论、证实旅游开发对目的地社会文化正面和负面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20]近年来形成的新共识是，争辩社会文化影响是好还是坏过于单纯也无意义。很难精确地测量和客观的解释社会文化的变化，文化的“衰退”、文化的“腐败”以及传统和民族的消失等说法可能过于主观。这些反思也挑战了人类学中“文化”和“民族”等关键概念。近来来，社会学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中也支持这一观点，很难用一个大而统的理论来概括社会发展中文化的作用，应注重不同文化的差异。

西方关于旅游对第三世界国家影响的详细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该领域的主导思想的是批判“警示平台”，实证调查对“警示平台”的挑战最大，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Graburn和Picard。[21]本派的学者主张，旅游是传统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协调的推动力。Graburn研究和描述了旅游对加拿大人和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新西兰的毛里求斯人和肯尼亚Kamba人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些少数民族在为外来者创作艺术品的过程中，也提高了自我认同感和自尊自豪感；这些少数民族“如此娴熟地使用他们擅长的特殊技巧，远胜于主流社会的水平”，同时他们知道白人“不可能在皂石上雕刻得像他们(爱斯基摩人)那么好。对于Navaho的珠宝和毛里人的木雕亦如是”。[22]

Sofield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指出利用价值判断来断定旅游是好是坏，或者旅游发展的对错过于简单化。只有基于详实的实证研究，通过检验冲突、共存和共生等概念性的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旅游发展。[23]

“冲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单元在目标上互不相容或互相排斥，从而产生心理上或行为上的矛盾。冲突是人类的共性，冲突既可能是外因引起、也可能是内因引起的。当个人、群体或者社会的行为举止被理解为对立面时，就已进入冲突。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冲突解决的方式。如果从冲突和力量的视角去观察旅游发展的话，就能够发现、理解眼前发展的历程，并且能够着手解决它。[24]简单地把旅游归结为有弊无利，并不能加深对情况的理解或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共存”是指位于同一空间内的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的个体之间极少或者毫无影响的状态。这个术语的一方指旅游发展，另一方指主体社区。根据Budowski的理论，这种状态不稳定，随着旅游活动的迅速发展，双方或演化成都满意的共生关系，或者冲突。[25]例如三亚亚龙湾度假区、广东的温泉度假区等一些封闭的旅游区，在初期发展阶段，社区和度假区似乎互不干涉，但是这种互不相干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周边社区和旅游区的冲突和矛盾不断而且还越演越烈。

“共生”是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生物学上，指一个生物体存活在另一个生物体中。这个词阐述旅游者和旅游地社区的关系时，意味着旅游者和旅游社区是相对独立的，但是都可以持续地从相互关系中获得利益。旅游地社区向游客提供设施、吸引物和旅游活动；游客使旅游地社区获得发展机会。实证研究表明，只要当地居民能够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社区和居民对旅游就会持积极的态度。而如果旅游发展中，当地居民在娱乐、个人隐私、生活方式等方面受到制约，就会产生反感的情绪。[26]如果旅游发展中充分考虑社区的需要和利益，那么旅游发展和当地社区之间就能达到稳定的共生状态。

四、人-文化-地点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都是把人-文化-地点当作既定的条件，而认同感就是这三个要素的总和。[27]对于旅游和游客来说，人+地点就是文化，例如，游客在故宫游览就是“体验中国文化”；在长城上感受“四千年不断的历史”；在西安参观兵马俑让游客回到帝国的过去；去丽江旅游主要是感触云南纳西少数民族的文化；到海南旅游不能不参加黎族的舞蹈。各级政府和当地居民就是利用人-文化-地点这种模式来促进民族旅游业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全球范围内，人-文化-地点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为了所有的人去了解国家及其原则，学校课堂上只是在不断地重复简化版的国家历史，国家秩序就是正常的和自然的秩序，“真正”的国家在空间上是固定的，可以在地图上辨认的；地图上的世界是离散的、有明确分割线、由不同的色块表达的国土。[28]以往的研究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很难改变社区和文化是合而为一的观念，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定地域上人和文化是盘根错节并深深扎根在本区域中；“祖国”这个概念就浸透着“自然”，含着浓郁的怀旧情绪。许多社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朴素想法，可以在与世隔绝的乡村或社区里找回过去。其实，乡村形象的重塑也是为了发展旅游业；乡村通过凸显“真实”、“本真”和“质朴”等符号，向游客表明与乡村相对立的其他都是假的、被制造的、可替代的或者只是现代的复制品。西方长期以来认为“怀旧”是旅游开发市场时创造出的概念，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质朴、纯净的乡村和与世隔绝的山岳一直都是审美和游览的对象。例如，诗人陶渊明就舍弃官位，回归乡村。《归园田居》诗中将他的怀旧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13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李白诗《独坐敬亭山》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更是描绘了中国文化中人与合一的象征关系。儒家的道德观中也强调仁者应该从自然中寻找终极真理，儒生应该从乡村获得书法、诗歌、绘画的灵感。[29]中国游客的旅游实际上是一种怀旧朝圣的旅程，他们游览那些文人骚客留下笔墨的名山大川，找寻诗歌、图画中描写的意境。例如近年来的凤凰、江南水乡等旅游热点的出现就是例证。

Gupta & Ferguson称人类学家目前关注的是地点-人-文化的脱节和分离，他们正热衷于反对“把地点作为体验的”。[30]而旅游业关心的却正好相反，旅游市场促销的口号就是要让游客到目的地体验当地的文化。在现代旅游生产系统中，游客通常是不会进入到旅游地的“后台”。MacCannel, I Urry和其他的研究者宣称游客总在追寻真实性和“他者”，希望透过表面现象体验奇异他者的“真实”文化，Cohen却指出大部分的游客是度假游客，旅游的主要动机是休闲、放松和娱乐，因此不会在乎去一个人造环境中参加“假节庆”的娱乐活动。

人类学的研究中，身份认同是自然地产生于特定的社区和地域，所在地的居民自然就是当地文化的所有者。但是有了国家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国家与社区共同拥有文化，国家可以重新定义文化和利用文化，国家决定向外界展示本土文化的哪个侧面及如何展示。因此，国家和旅游业在对待文化的方式和方法上与旅游有类似之处，两者都试图将特定地理区域从周边环境分离出来，都把强调此区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作为工作重点。[31]

国际旅游对塑造或再造亚洲国家的形象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西方各种旅游手册、网页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而“孤独星球”的发行量和影响远远大于人类学著作。因而格类本提议联合国利用民族旅游实现政策目标。[32]总之，人类学的挑战不是否认旅游研究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而是要研究旅游的动态变化，探索旅游系统的复杂性，和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

五、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架构

Jafari倡导的“知识库平台”是旅游人类学发展的趋势，它要求旅游及相关方面的论断应基于调查研究而非主观看法和个人情感。强调研究者必须严谨地选择和运用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特别注意影响客观结论的内外因素。结合Hitch-cock, King和Parnwell框架性的分析思路和旅游发展的实践，旅游人类学在开展研究时，应特别注意：[33]

调查研究的时间/时期。对一些问题的跟踪研究表明，旅游产生负面影响的研究结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得到相反的结论，反之亦然。与收集数据长达数年的纵向研究相反，“快照式调查”（对特定领域作短期调查）会有误导而不能如实反映出事情的进展。

某个特定的案例分析、社会等级、民族团体或社区都会反映出主客关系的本质，因此必须谨慎对待普遍性规律。旅游给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人带来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或备受剥削，有的或因此获利。

不同的策略和不同的旅游形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旅游者的到访数量、逗留时间和消费水平会给当地社区和文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发展适应性旅游(adaptive tourism)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保持对旅游饱和度高度敏感，同时根据适当的承载能力加以引导。

旅游者的来源和族群背景显然会产生不同影响。在亚洲许多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中国)，以本国居民和其他亚洲人为主体的旅游就比以西方旅游者为主的旅游要发达得多，所以西方旅游给东方文化带来伤害的流行观点有待商榷。

不应该单独强调旅游的影响，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交通的改善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现代价值观，比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时间长，也更深刻。同时，vanW illigen将应用人类学在发展问题中的运用研究分为干预人类学和政策研究。本文作者根据旅游业的具体情况，在vanW illigen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与各研究领域与旅游的关系如下，供旅游人类学家参考借鉴。[34]

干预人类学在旅游中的领域可分为：行动人类学，研究与发展人类学，社区发展，鼓动人类学，文化掇客，社会营销。这几个领域在旅游中运用的针对性也各有不同。行动人类学适用于制定以社区目标的、价值明晰的策略，例如社区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旅游等，在政策研究的运用领域主要为社会影响。研究与发展人类学则基于研究基础上的参与式干涉，例如为文化和遗产旅游发展

而收集的社区人口社会经济数据,主要用于调查评估,监测正在运营的旅游项目、判定项目的成功与否。社区发展用于分析社区参与和志愿合作的自助行动,在实践中致力于促进社区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新知识、采纳新技术的了解和运用。鼓动人类学通过提供数据信息和技术支持援助支持社区发展旅游的行动,主要的实际工作则是资源评估。文化搭客通过个人(人类学家)的干预把平等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人们连接起来,编制达成共识的旅游发展议程。社会营销则把商业营销和应用社会科学结合起来,通过研究制定策略,引导人们的行为,使游客和旅游社区都获益。

六、结 论

在旅游高速发展的中国,人类学应该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区旅游、特色民族旅游、消除贫穷相关的政策制定和规划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文化遗产、物质遗产和传统手工技能的保护和支持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将这些成果运用在旅游中可以提高旅游项目的可持续性。

西方在应用人类学研究和运用上走了弯路,长期困扰于人类学是否应该运用于旅游发展的问题,直到最近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环境有利于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周大明在回顾应用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中指出,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在建立之初就具有应用的目标。[35]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人类学家就已经开展了旅游发展应用研究,并已取得一些成果。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自觉地靠拢Jafari的“知识库平台”,以客观分析为目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着重对旅游的整体把握,推进旅游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和对实践的指导。

(感谢王日晶为本文提供的部分翻译工作)

作者简介:

Trevor Sofield, 澳大利亚塔斯美尼亚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和澳大利亚格理菲斯旅游学院兼职教授。

徐红罡,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资料来源:《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

[①] Brown, R. Anthropology as Public Service and Malinowski's Contribution to It. Cited in Sills, D. L. A Dictiona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32.

[②] Mead, M., Chapple, E-D and Brown, G-G-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Ethics. Human Organization, 1949, 8 (2): PP-20~21.

[③] Fiske, S. J. and Chambers, E. Status and Trends: Practice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Hil, I C. E. and Baba, M. L. The Globalization of Anthropology. NAPA Bulletin 25, Washingto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06.

[④] Hil, I C. E. and Baba, M. L.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nthropology: Rebuilding a Fractured Synthesis. NAPA Bulletin 18, Washingto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⑤] Hil, I C. E. and Baba, M. L. The Globalization of Anthropology. NAPA Bulletin 25, Washingto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06.

[⑥] Briguglio, L., B. Archer, J. Jafari and G. Wall Sustainable Tourism in Islands and Small States: Issues and Policies. London: Pinter, 1996.

[⑦] V. Smith. Hosts and Guest: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Oxford: Blackwell, 1978.

[⑧] Nash, D. Tourism as an Anthropological Subject.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1, 22 (5): PP-461~481.

[⑨] Jafari, J.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The Basis of Tourism Education. 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 1990, 1 (1): PP-33~41.

[⑩] 刘振礼:《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影响及对策》,《旅游学刊》1992年,第3期。

[⑪] 陈德广:《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看旅游学学科发展》,《旅游学刊》2004年第6期。

[⑫] 余 洁, 马耀峰, 苟晓东:《近年来中国旅游研究的现状及热点问题述评》,《经济地理》2006年第4期。

[⑬] 苏 勤, 林炳耀:《基于态度与行为的我国旅游地居民的类型划分——以西递、周庄、九华山为例》,《地理研究》2004年第1期。

[⑭] Wood, R. E. Tourism, Culture a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Hitchcock, M., King, V. T. and Parnwell, I M-J-G. Touris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48~70.

[⑮] Nash, D. Tourism as an Anthropological Subject.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1, 22 (5): PP-461~481.

[⑯] Pi-Sunyer, O. Through Native Eyes: Tourists and Tourism in a Catalan Maritime Community. Smith, V.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7: PP-149~156.

[⑰] Picard, M. Bal: i Cultural Tourism and Touristic Culture. Singapore: Archipelago, 1996.

[⑱] Worsley, P. The Three Worlds: 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Weiner, M. and Huntington, S. P.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Wood, R. E. Tourism, Culture a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Hitchcock, M., King, V. T. and Parnwell, I M. J. G. Touris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48~70.

[⑲] Hitchcock, M., King, V. T., and Parnwell, I M. J. G. Touris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3.

- [20] 潘秋玲, 李文生. 我国近年来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 《经济地理》2004年第3期。
- [21] Graburn, N. H.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3, (10): PP-9~33-Pi-Sunyer, O. Through Native Eyes: Tourists and Tourism in a Catalan Maritime Community. Smith, V.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7: PP-149~156-Picard, M. Cultural Tourism in Bali: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M. Hitchcock, V. T. King and M. J. G. Parnwell. *Touris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71~98.
- [22] Graburn, N. H. *Ethnic and Tourist Arts: Cultural Expressions from the Fourth Worl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23] Sofield, T. H. B.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raditional Socio-cultural Values in the South Pacific: Conflict, Co-existence and Symbiosi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arine and Coastal Tourism*, East West Center, Honolulu, Hawaii, 1990, PP-27~56.
- [2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Sofield, T. H. B. *Empowerment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London: Pergamon, 2003.
- [25] Budowski, G. Tourism and Conservation: Conflict, Coexistence and Symbiosi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1976, 4 (3): PP-27~31.
- [26] Pearce, P. L., Moscardo, G. and Ross, G. F. Tourism Impact and Community Perception: An Equity-Social Representational Perspective. *Australian Psychologist*, 1991, 26: PP-147~152.
- [27] Gupta, A. and Ferguson, J. 1997.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8] Malkki, L. H.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Rooting of People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cholars And Refugees. Gupta, A. and Ferguson, J.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52~74.
- [29] Petersen, Y. Y. The Chinese Landscape as a Tourist Attraction: Image and Reality. Lew, A. and Yu, L. *Tourism in China. Geographi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P-141~154.
- [30] Gupta, A. and Ferguson, J. 1997.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1] Leong, W. T. Culture and the State: Manufacturing Traditions for Tourism.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89, (6): PP-355~375.
- Sofield, T. H. B. and Li, F. M. S. China: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olici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8, 25 (2): PP-323~353.
- [32] Graburn, N. H. *Tourism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Yamashita, S., Din, K. H., and Eades, J. S. *Tourism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Oceania*. Selangor: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997.
- [33] 潘秋玲, 李文生: 《我国近年来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 《经济地理》2004年第3期。
- [34] vanWillingen, J. *Applied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Bergin & Garvey: Westport, CT, 1993.
- [35] 周大明: 《应用人类学与中国实践》,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6期。

